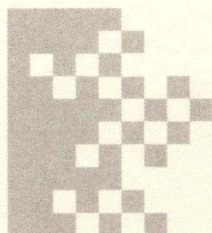


传统文化传承论

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责任

CHUANTONGWENHUA CHUANCHENGLUN

容中達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统文化传承论
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责任

CHUANTONGWENHUA CHUANCHENGLUN

容中逵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传承论: 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责任 / 容中
逵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95-0638-5

I. 传… II. 容… III. 教育工作—研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718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11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

一、为何要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	2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情形如何?	5
三、如何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这一问题?	13

第一章 三种语境: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之缘由考

一、“全球”语境:全球化中的权力因素及同质化倾向	23
二、“中国”语境: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相对式微	31
三、“教育”语境:教育本质的文化传承工具性及其缺失	40

第二章 层级结构: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现状考

一、家庭教育:难足传统文化传承之需	46
二、学校教育:难担传统文化传承之任	59

三、大众传媒教育：难担传统文化传承之任	88
四、国家宏观教育决策：难逃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责	99

第三章 内因外缘：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成因考

一、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自身”因素	108
二、当前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他者”因素	125

第四章 认知基础：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之观念考

一、守或弃：“反思中和”之守成主义文化观	136
二、怎么守：“三位一体”之教育整体传统文化传承观	147
三、守什么：“中国文化精神”之教育传统文化传承内容观	158

第五章 行为操作：当代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之践行考

一、家庭教育：以行为系统为侧重的传统文化传承践行	171
二、学校教育：以智识系统为侧重的传统文化传承践行	184
三、大众传媒教育：以价值取向系统为侧重的传统文化传承践行	207

结 语 一项迫切需要加强的任务	218
-----------------------	-----

主要参考文献	226
--------------	-----

后记	235
----------	-----

导论

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
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
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清·纳兰性德《采桑子》

教育这一“上所施、下所效”，“养子使作善”的活动是任何一个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民族国家所必须应对的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急速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教育在促进经济繁荣、维护社会安定、增进政治民主、强化国民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如果说孙子在春秋时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基于当时“五霸”之势，那么在当今这一和平与发展的“历史终结”（弗朗西斯·福山语）之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早已为各国所认同，并日益成为重要议题。当然，在此笔者并非言军事经济之不重要，相反，是想表明在这个争演主角的 21 世纪，只有“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才能确保吾国吾民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教育应当如何发展？对此，我们可能一时难理其绪。因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相异的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其侧重点亦会大异其趣，因此，对如此关乎社稷民生的教育问题，在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时更应谨小慎微，毕竟，

“相互竞争的哲学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每种哲学都会在各种装束下运用于实践并产生不同的效果”^①。本著主要立足教育,依据文化这一主线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身为一名中国公民和未来学者,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大胆探索,当属责无旁贷。

一、为何要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

任何一项研究,在其展开之初都需阐明其研究之必需性,一则,试图论证该问题本身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确实意义重大,值得思考;二则,试图表明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尚需拓展,有待深入。据此,本节将先就第一个问题稍加阐释,下节再对第二个问题详加论述。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信息网络、跨国金融资本等在全球范围的迅猛扩张,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意识、区域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加速高涨,民族国家越发重视本民族的族别属性、捍卫和坚守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文化的多元化和冲突愈演愈烈。的确,世界已进入一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②时代,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军事和政治意识形态退居其次,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步入前台,各国日益重视对外交往中的“软”实力,不仅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国际政治的知识化(文化)转型”^③,在学术研究上亦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④。于是,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或针对国际文化交流,强化对本民族国家文化的保护,如法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关

① [美]莱斯顿·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5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 页。

③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④ 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关于当代西方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 页。

贸总协定谈判中,就以“文化例外”政策,拒绝将文化产品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之中,加拿大亦采取断然措施努力抵制来自美国的文化威胁;或针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整合人心,如新加坡、韩国不断出台各项制度措施,强调儒家文化认同,日本也一再强调不失国际性的民族国家亚洲身份体认;等等。一时间,文化研究成为显学而备受世人关注。可见,在这种国际国内总体文化转向的历史境遇下,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传承问题实乃大势所趋,此其一。

在日渐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中,在人们信誓旦旦地追逐“现代性”、不约而同且毫无戒备地使用“全球化”这一貌似中立的术语来界定当下时代的特征时,我们却日益发现:在这个所谓的价值多元共存时代,缘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权力因素,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暗藏着“普世化”或“同质化”倾向。另外,我们的民族文化似乎已愈发难以整合民心,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亦日显模糊。这不仅表现在自明末以降民族文化传统日渐式微的历史演进历程中,还表现在国人一厢情愿的普世主义思维定式、妄自菲薄的文化自卑心态等思想认识层面上,更表现在国人日益忽视本国语言文字、追随世界通用语,捐弃本国传统文化内容、求取西方文化精神资源,贬损本族传统道德规范、盲从西方行为举止等具体行为操作层面上。然而,文化于国民身份认同之醒目地位、传统于当下民族国家建设之积极作用等都使我们对此不可袖手旁观,因为上述情形会直接导致国家意识的日趋衰微、传统文化观念的日益淡薄、民族自信心的逐渐减弱以及凝聚力、向心力的每况愈下。诚然,“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种动力和必然趋势,我们无法选择它,“西方”作为一种发展的客观参照物,我们也无法回避它,但我们在拓展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却不可邯郸学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在民族经济实力日强、国际地位日显、国人生活日佳的当下,与其“临渊羡鱼”,在奔波于命地追逐“现代性”过程中迷失自身、不知何去何从,不如“退而结网”,在国人固有的文化传承赓续中稳打稳扎,逐次自强臻善,此其二。

此间,如何才能在提升民族现代性、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上确保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如何才能把握一个合适的“度”,确保“和而不同”,显然,教育的文化传承功用不可小觑。因为,从文化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继承性是其固有的特征,其

最为根本的传承途径是广义上的教育；从教育来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其本质是“主体间的文化传承”^①。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诚如有学者所言，“细致察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从学科知识分类、课程设置、教学技术、教学方法到教育模式和教育思想理论，还有多少称得上是我们本土传统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这种殖民化过程较之高等教育往往更为隐蔽，因而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刻”^②。作为一个绵延五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国，中国自应有她一套特有的文化逻辑，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文化也就是一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③。我们本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自己的社会先变成一张与传统毫无关系的白纸，再在上面重新画上现代化的美景”^④。但令人遗憾的是，国人对上述两个前提性认识过于暧昧、过于虚无、过于想当然，以至于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教育在文化传承上的功用，继而使教育在改革中如失的之箭，飘萍无根，居无定所。从这一角度讲，研究该问题确属人心所向，此其三。

有鉴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一是对当今中国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内涵、特征、表现作一“夸张”式揭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及当下民族文化传统的式微情状作一“体认”式描述，对教育与文化、教育在文化传承中所应发挥的功用作一“学理”式阐释。二是对当前我国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培养民族文化自主意识、重建民族文化传统精神中应发挥的功用及存在的问题作一力所能及的粗浅分析。三是在此基础上，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三方面，就如何通过教育有效传承赓续中国文化提出部分貌似成形的看法。一言以蔽之，即：通过认清当今时代特征，了解我国文化与教育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教育文

① 雷鸣强：《教育功效观——一个教育原理的新视角》，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② 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1页。

④ 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吁请广大政策决断者、各级行政管理者、学术研究者乃至民众,在发展经济、加强国防、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同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继而改进文化战略、完善教育的文化传承机能,切实增强国民的历史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树立文化自信、自尊、自主意识;在身份认同逐渐模糊的“世界公民”时代,通过培育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精神且不乏国际视野的“文化中国人”醒目示诸全球,以适应 21 世纪纷繁复杂、布满陷阱的全球化挑战。毫不夸张,这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焦灼之情便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此其四。

关于教育文化传承这一问题本身之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笔者将在第一章详细论述,在此暂告一段落。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情形如何?

对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当前我国的研究现状又如何?据笔者对该问题所做的文献综合分析来看,研究还可进一步拓展深入。

其一,先来对全球化(文化视角)、传统文化、中国教育的文化传承三个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情状及特征作一别类分析。

首先,关于文化视角下的全球化(后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

就研究情状而言,后殖民主义思想远在二战期间就已产生,其时,后殖民主义的先驱代表艾梅·塞泽尔(Aime Césaire)、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希努亚·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就提出,“作为被殖民统治的东方民族,不仅要追求政治上的独立,更要摆脱心灵上的被殖民状态”^①。但由于当时其仍处于边缘地位,影响不是很大,直到 1978 年美国的阿拉伯后裔学者萨义德(Edward W. Said)出版《东方学》一书后才逐渐成势,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思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该思潮已流行全世界。在国外,虽然关于后殖民论述的方式不同、观点各异,但大体可以区分

^① 法农：《论民族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78 页。

为“以萨义德、斯皮瓦克、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莫汉迪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三种流派。^① 由于后结构主义流派被公认为后殖民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所以国外关于后殖民的讨论大多也都绕此进行,而该派的上述三位领军人物也因其鞭辟入里的话语分析独树一帜、名噪一时。^② 在国内,相关论述也大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译介期、90年代中后的评判期、21世纪初的追踪期三个阶段。^③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在70—80年代得以发展,90年代达到高潮。在国外,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有多种,如“文明冲突论”(亨廷顿)以其睿智锐利的视角及措辞独树一帜、“历史终结论”(福山)以其骇人听闻的宣言天马行空、“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以其狡黠的辩护与坚定的资产阶级立场称著于世、“文化殖民论”(萨义德)以其色彩斑驳的话语分析令稍有殖民经历的民族与国家为之兴奋鼓舞……他们有的通过理论的旁征博引和事实的精选罗列,对其现象及成因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并对其大加挞伐,有的则为其开脱罪责,极力辩护。在国内,

①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2页。

② 相关内容详见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 Atanot, Willy Maley (1997): 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don. 和 Bryan S. Turner (1994):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 London. 两著中之论述。

③ 具体讲:一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译介期。主要是对西方后殖民理论进行大量的译介传播,此间以《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义德1978、1993)、《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张颐武,1990)、《西方文化霸权与东方的边缘性》(王宏图,1992)、《欧美眼中的“非我族类”》(张宽,1993)、《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文化》(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朱伟,1994)、《“后东方”视点:穿过表象与错觉》(陈晓明,1994)、《东方之误》(邵建,1994)等为代表。二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的评判期。主要是对此前译介引入中国的上述理论进行了理解与消化,并产生自身不同的看法,此间以《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对话还对峙?》、《东方主义反思》(王宁,1995、1996)、《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若干后殖民批评语汇的思考》、《小说的“始源”、权威与霸权——萨伊德“文学霸权理论”管窥》(丛郁,1995)、《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徐贲,1996)、《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罗钢1997)、《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王宁,1998)、《后殖民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1999)等为代表。三为21世纪初的追踪期,主要是对后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情况及其在世界和中国的影响进行跟踪研究,此间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赵小雷,2001)、《后殖民文化批评和后现代语境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郭军,2000)和《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王宁,2003)等为代表。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则以下述四人为要,刘伟胜先生从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入手,着重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角度,以数据和事例形式罗列了文化帝国主义进攻的态势与情形,呼吁国人应该高度重视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及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并从国家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就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出了相应建议^①;张骥等先生以国际政治理论为依托,从文化这一主线,分别对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国家安全、国家外交、国际冲突、国际合作的关系做了阐述,就文化全球化和国际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文化霸权与文化抗争以及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②;孙晶先生从分析文化霸权的理论形态着手,对文化霸权的思想框架和理论特征进行概括总结,对全球化及多维视角下的文化霸权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分析影响当前我国文化安全几项主要因素——诸如西方文化霸权的进攻、文化产品裹挟意识形态的入侵、国内安全意识的下降、信息网络化的渗透等——的基础上,从国家机制和思想意识层面对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出了相应措施^③;胡惠林先生则从国家安全角度,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简史、现存危机和具体对策进行了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论述^④。

就研究特点而言,后殖民研究有如下四个共性:一是其研究多与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研究并蒂连理、相生相随;二是其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文化领域;三是其研究多与民族主义、原殖民地如何解殖休戚相关,对国际关系中之民族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尤为关注;四是人们对其观点的评判虽然莫衷一是、各不相同,但基本可划归赞同者和反对者两类,前者将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话语予以接受,并加以完善,后者对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提出强烈质疑,并大力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则有如下三个共性:一是其研究多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息息相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二是国外研究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避免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这类过激语词,

① 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骥：《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④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而以中性的“全球化”或“现代化”等语词来解释普遍存在于国际交往中的权力因素,这类研究尤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最;另一类是用文化帝国主义来解析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之争,揭示隐藏其间的殖民特性,这类研究尤以殖民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为最。三是国内研究多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力斥文化帝国主义对我的破坏性为主,少有正视文化帝国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及互向性特征的。

其次,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

就研究情状而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可谓自华夏大地之日起就亘古有之,为研究方便,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可归为文化史研究,此处不作详察,只作学习与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则又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寂静期,此间,迫于“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及阶级斗争的淫威,文化研究一度受滞,几近空白,除少数出版社印刷的一些近代大师关于文化观的著述外,剩下的似乎就只有苏联从哲学派生出来的文化哲学论了,还不成势;二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此间,解锢去禁后的国人在一片自由声中掀起改革开放高潮,大有如释重负之感,于是整饬心情,为更好地向西方学习而磨刀霍霍,“文化热”应势而生;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此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在目睹自由主义的恶端之后,态度突变,结合海外“儒学复兴论”,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抬头,又开始主张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王财贵、蒋庆等的读经运动,陈明、康晓光等的新保守主义和2004年汤一介、许嘉璐等先生发表的《甲申宣言》可谓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传统文化的著述庞杂纷呈,限于笔者能力,在此,先暂告一段落。

就其特点而言,从论争的派别来看:一是其间论争颇多且齟齬甚重。不管具体争论情形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均秉承了自近代以降的争论风格,围绕“西方”自由主义和“中方”保守主义两极,就中国文化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着或全盘西化、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综合创造,或东方文化、国学复兴、文化复古的不息辩论。二是国内“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海外新儒学的遥相呼应。以康晓光和陈明等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从1990年创办《原道》刊物以来,虽然一波多折,但至今却也聚众成

势、小有影响,而2000年和2004年连续两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宣言更强化了这一趋势,加上蛰居台湾的韦政通、香港的四大文化书院及远在美国的杜维明、成中英等新儒学大家,更是为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拾薪添火,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将会不断升温加热。三是自由主义仍呈主流。虽说上述保守主义倾向有所抬头,但总体而言,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市民阶层的形成、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纵深发展,自由主义仍是引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这一点从停办的几家关于传统文化的刊物中可见一斑。从论争的内容来看:一是对传统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多以历史断代为主,除部分从事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外,少有从中西关系维度来认识传统文化发展史的;二是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认识多以文化精神为要,虽然其间具体陈词不一,但其观点大体一致;三是对文化研究的目的、任务多以转型为旨,不管何门何派,也不论其对传统文化的具体态度如何,其研究目的最终都会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在当下情境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西化”论者自不待言,他们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叙事蓝本,以现代性来“规训与惩罚”(福柯语)传统文化,促其步入全球化轨道。保守主义者,虽然强调稳操文化根柢,但在如何使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尽快完成现代化转型上这一点上亦无二致。总之,此间虽然观点不同、路数不一,但主旨一致,均是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改造为鹄的,所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对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作设身处地、客观的正面首肯。

再次,关于文化与教育、全球化时代下教育的文化传承研究。

就研究情状而言,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关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这方面可以《教育概论》(叶澜,1991)、《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石中英,2001)、《教育文化学》(刁培萼,1999)、《教育文化学》(郑金洲,2001)、《教育人类学》(冯增俊)、《教育功效观——一个教育原理的新视角》(雷鸣强,2001)及国内其他一些《教育学》为代表。这些著作基本明确了文化与教育相互依存的关系,即民族文化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制度等方面对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则在文化的选择、传播、融合、变迁与创造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二者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者既可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可能冲突

抵牾,一损俱损。还有学者从“社会—文化—个体”和“教育—文化—生活”角度提出了教育的“文化中介本质论”^①。当然,国内出版的其他教育学著作也部分地对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作了阐述。二是关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这方面可以《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顾明远,1998)、《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顾明远,2004)、《教育:传统与变革》(顾明远,2004)、《中国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黄济,2001)、《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丁钢,1998)、《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使命》(黄书光,2001)、《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黄书光,2004)等为代表。这些著作不仅认识到了中国教育文化属性,而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展望,对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前提下发展中国教育提出了中肯意见。三是关于全球化时代下文化与教育问题的研究。这方面可以《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项贤明,2001)、《全球化与中国教育》(王啸,2002)、《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邹志辉,2004)、《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教育——一种方法论视角》(杨小微,2004)和王长纯先生关于“和而不同”的系列比较教育研究著述等为代表。他们都从全球化或后殖民角度对当下中国教育的问题给予了观照,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如项贤明教授提出的“本土生长”和王长纯先生提出的“和而不同”等理论堪称明证。另外,其他如《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朱旭东,1996)、《现代德国文化教育》(邹进,1995)等也为我们提供了国外的相关资料,均可作参考。四是关于教育的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综观已有文献,除《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王军,2004)从人类学角度来探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承与幼儿教育》(庞丽娟,2004)从幼儿阶段来探讨文化的传承外,似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这一领域,探讨更多的是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而鲜有关涉中小学教育的。这方面当以华中科技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开展的国学研究及其教育为代表,他们不仅从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地位、作用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运用高等教育基本原

^① 雷鸣强:《教育功效观——一个教育原理的新视角》,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理,在加强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意义、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都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而且还就此在全国交相呼吁、奔走呼号。另外,就是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来研究教育的文化传承问题的,如《论国家文化安全》(石中英,2004)、《教育:国家安全的基础——关于“教育安全”的思考》(程方平,2006)及其他相关研究。

就研究特点而言主要有二:一是研究尚属起步,领域主要集中在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关系上,还未向纵深推进。从上述罗列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二者基本关系的梳理和教育文化学学科的“正名”上,而对这些基本关系的进一步表述较少。如,人们现在大多已认同教育的文化功能包括文化的生成、传承、交流、融合、创造等,但具体到其间各项功能,我们并没有作深入研究,如何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当怎样通过教育这一工具维护自己文化的自主性?怎样才能有效发挥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亦未得到堪称系统的研究,遑论对家庭教育和大众传媒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有所研究了。不过,叶澜教授近些年来结合全球化现象,将“全球化时代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研究提上了日程^①。二是研究的问题明确,各有专攻,但还未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时代下教育的文化传承问题。上述的研究明显具有以下倾向:一则,对文化与教育基本关系的研究似乎倍受教育基本原理专业的青睐,后殖民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教育问题似乎更为比较教育所专攻,而高等教育专业则似乎对大学生的文化传承问题情有独钟。二则,研究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视野大都局限于国内,未将其纳入国际关系当中予以考察,这样难免会使研究有失立场性。三则,就全球化时代教育文化传承的路径,国内还相对缺乏研究,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领域,忽视了文化传承实乃一综合网络构建活动,从而使得对家庭教育、大众传媒教育等领域的文化传承研究付之阙如。

① 目前国内关于学校教育文化使命的研究,当以叶澜先生的《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一文为最。她以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的文化理论为前提,就如何在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加剧时期构建具有超前意识的学校新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如何对现有社会文化进行改造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提出了所需遵循的“取舍、综合、转化”三原则,并就学校新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及整合的主要方面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的看法。

其二,结合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情状及特征,再来小结一下其间存在的问题。如上所述,尽管国人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这一论题已做了许多相关研究,并且成绩斐然,但上述研究在整体态势和具体研究方面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就整体态势而言,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大有被忽视与曲解之嫌:一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及著述不多。“否定之否定规律”使得国人对民族意识及文化安全的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展开,相反,在此之前为适应改革开放政策而带来的全盘西化倒是余波未了,这一现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观,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确实不多。二是国人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心存余悸、颇有曲误。提倡国家意识、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之人,要么被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要么被当作“文化保守主义者”,要么干脆被扣上“否定改革开放”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正如封闭的年代稍有求新的表现即会被视为异端一样,在开放的年代,对外来文化的反省也很容易被贬斥为固执和保守,其实,这正是历史上那特殊的十年给国人带来的一种很不健康的思维定式。”^①正是在这种情形才致使一再出现“全球化化不了中国、谁能殖民中国、中国文论何来失语”^②等自欺欺人的诳语,才会将研究与借鉴后殖民理论的学人贬为“为摆脱政治和经济身份危机,寻求社会地位增势,而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③上述现象普遍存在于以上三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因此,有必要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作一厘清,并明确相应立场。

其次,从具体研究来看,其间主要存在以下两个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对全球化、中国文化、教育三者所进行的是一种分离式研究,没有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虽然关于三者的纵深研究颇具成果,但如若不将其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予以系统分析,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并且对解决现实具体问题也助益不大。另外,如前分析研究特点时所指出的,三者本身的研究亦存在许多问题,如国内学人

① 项贤明:《开放、自尊与文化殖民》,《学术界》,2002年第5期,第131页。

② 赵小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关于全球化、后殖民争论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15页。

③ 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第69页。